

革命報人戴傳賢

徐詠平

戴傳賢先生字選堂，又字季陶，晚號孝園。民國紀元前二十二年（清光緒十六年）十一月廿六日誕生於四川漢州，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病逝廣州，享壽六十歲。先生天資明敏，才氣縱橫，述作甚豐。

民國紀元前七年，先生十六歲，東渡留學於日本某師範學校。是年「民報」在東京發刊。十八歲，畢業於日本某師範學校。秋間轉入日本大學法科肄業。日常喜寫小品文字或小說，尤其是日本詩歌，不談政治學術。所寫小說常用「散紅生」筆名，發表於日本新聞雜誌，餘作隨存隨失，絕不留稿。生平擅於語言，喜笑怒罵，無非文章。如能一一筆錄，不失為極饒興趣之佳作。

民國前三年，先生廿歲，自日回國，任蘇州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。時清廷頒佈憲法大綱，先生為文評論。某大員以其毀謗朝廷，言於蘇撫瑞澂。瑞澂曰：「朝廷頒佈憲法大綱，亟需臣民抒陳意見，庸何傷？」翌年瑞澂升任湖廣總督，先生離蘇赴滬，任職於上海「中外日報」社，未幾「天鐸報」徵求各省新聞編輯，先生往應徵。社長慈谿陳杞懷先生出題面試，限一小時

交卷。先生獲選，任事後月薪三十元。夙夜兢兢，將全身精力貢獻於報社，以是不數旬一躍而為總編輯。其於民國卅年元月致中央黨部葉秘書長朱部長書內曾云：「昔年傳賢初入報界，職僅各省新聞編輯員，其地位只高於校對員一籌。一月薪只卅元。而此地位之來，乃係經社長陳杞懷先生出題面試，限一小時交卷，勉強及格之結果。自後夙夜兢兢，將全身精力，乃至生命一切，貢獻之於報社。任總編輯以後，自問勤苦艱難，更數倍於作尋常編輯員之時。雖一切紙面，校對文稿，應酬讀者，或不免於疏忽謬誤；惟竭盡其所能，廢寢忘餐，不敢一絲苟且，則所敢自信。蓋不如此，則不可與聞日報週刊月刊等事業」。

先生所著社論，用「天仇」筆名，詞鋒犀利，言論激越，富煽動力，讀者極感興趣，遂名滿海內。

民前一年春，先生與鈕有恒女士結婚請假，由陳布雷先生代理筆政。先生銷假後不久，「天鐸報」文字獄起。得上會會廳公堂關炯之先生之力，子身亡命走日本之長崎，居兩週潛歸，回湖州居雲巢山道觀。旋得四川雷鐵崖之介，至南洋

檳榔嶼任「光華報」編輯。「時革命黨人在欽、廉、鎮南關、河口各地相繼敗挫，黨人紛集南洋。仰光同志莊銀安及榔檳嶼同志陳新政、黃金慶等合辦「光華報」於檳榔嶼，鼓吹革命，由方南岡主持筆政，與蜀人雷鐵崖在報上大聲疾呼，發聾振聵，使僑胞之精神，為之一振」。（革命逸史三集二七八頁）。先生參加「光華報」編務後，鼓吹革命益力。是時，先生加入同盟會。

武昌起義後，先生回滬，與貴陽周少衡（浩）組織「民權報」，對時事多所主張，而於時政尤多評論，慷慨激昂，無稍顧忌，乃觸怒當局，於五月廿日為租界巡捕房出票拘押，謂「戴天仇鼓吹閱報者殺袁（世凱）唐（紹儀）熊（希齡）章（炳麟），應即提究。」先生於自述經過時說：「甫提筆續晚稿，忽來獄吏，出拘票以示，笑且言，票上大書特書「戴天仇鼓吹閱報者殺袁唐熊章，應即提究」。余聞提票，竟不禁大怪。我行我素，既未妨租界之治安，亦未違法定之明文。吹竊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何竟出此？雖然來在短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？去即去耳，何多言？復詢陳華其人者。天仇笑曰：「本社並無陳華其人

。

。吾作文，吾負責。」彼又曰：「發行者何人？」天仇更笑曰：「君等執法之人，法制之拘票中，既無發行人，何能涉及無關係之第三者？行矣！」遂行。到捕房，天仇脫帽，詢獄吏：「原告何人？與租界捕房何涉？租界捕房有此權責否？」置不答，命繳隨身品，時計、名片、圖章、銀幣，悉付之。竟導予入暗室。予欲言自制，笑謂曰：「今日方知獄吏更。更默想曰：今日益知專制苦。」

「入室，獄吏去，鍵戶。室半暗。陰氣逼人。中已有二人在，皆起視余。見衣冠楚楚，笑詢曰：「公何故亦來此？」予曰：「蒼擗造字累我，鴉片條約病我。實言之，強弱關係害我。我識字，我住租界，我不作官，我弱，我為中國人。有這種原因，我遂來此矣。我不入地獄，誰肯入地獄？我不成佛，己身不淨，不證菩提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言未竟，友人數輩來省予矣。一小錢孔，僅可對話。旋慰問者，贈食者，殷勤懇切。皆較平日親數倍。諸君去，同室之少者，以英語為予唱教會歌。音高遠，催人入夢去。忽有人呼起，隔窗戶詢，聞予愛妻聲。謂予曰：「君以國事至此，予甚慰。主筆不入獄，不是好主筆。周浩君常言也。予為君賀。」語竟遂去。予亦就寢。」

「此一事也，在閱者諸君，將以何種感情對之乎？以何種觀念論我乎？予殊不能逆料。雖然，是必有人議及。予疲極矣，尚有無限感情，在明日早起，當揮筆為諸君陳之。今夕恕我早寢也。」（原文見戴天仇集）。

租界巡捕房不能入先生以罪，越日釋歸。

先生在「民權報」撰論及短評，於民二集印文集。短評曰「單刀直入錄」。恒喜筆戰，維護言論自由最力。是年「民權報」增出副刊，命名「飛艇」。八月間先生遊歷南洋，十月返滬，撰「產業發展策」及「男女平等教育論」二文，刊於「民權報」。元年九月，先生任「國父機要秘書，記錄 國父講述建國之道，百日間成「民國政治綱領」及「錢幣改革要義」二書。民二隨國父居日，參加「國民雜誌（月刊）」編輯工作，並負責撰寫「世界大事記」，按期發表。以倒敘法將事件自今及古及其原因加以說明，並分析此一事件在現時代中之各種關係。條理分明，旁徵詳列。先生嘗述大事記寫法：

「蓋曰大事，必有一個判別，甚麼叫大事？將此判斷，確實剖析清楚，如以尺量布，以升量米，任何人都一見便知方得。今之記事，完全是一本流水簿，無大小之可言。其何以為大之意義，賢者閱數次，總看不出。此種作風，完全東方雜誌等一月半月等大事記的氣象，真要被天下庸人的項羽斷殺也。賢在十八年前，曾為民國月刊編世界大事記一欄，分歐洲、美洲、亞洲三部分。……每一難題，常命助手到圖書館去查書，而自己去尋專家討論請教。每月所記，不過十數節，至多三萬言，而其辛苦較十萬言文章尤甚。……賢之記載法是立一分別事件之大小之量尺，以此量尺衡度一切時事問題，擇其合於我之所量者若干件，將此若干件，一方用倒敘法，自今及古，追至事件發生之源頭；一面從橫的方面，看出此事件在時代中之

各種關係，而個別問題，不在本事件直接關係中者，亦得徵詳列，使看者知此事件在現時之重要。如此，便自然由空間時間兩方面，寫出事之所以大來。……因此一作法，實在十分喫力，非下死工夫，斷難有成。……近代各雜誌新聞乃至年鑑專書之所謂大事記者，尚無此作風，而亦無人肯如此下死工夫。因之凡近年出版之大事記，都不知其何以為大，亦看不出一個記字的意義來，大都是流水簿，尚不能算是收支總簿。」（戴季陶先生文存「致辛樹幟先生書」，廿二年七月）

戴先生在「國民雜誌」獨語「短文中，主張文字革命，謂「中國不僅政治專制，即文字亦專制，因作文者只供少數人閱讀，而不供多數人看，不求介紹新知識、新思想，只沿襲陳腐舊套，將殘書爛字，翻覆迷人，豈非專制之甚？必須推翻文字之專制、守舊、腐敗，一切文字須求平易實在，要使文字皆能通曉，以期教育普及，國民知識，遂漸發達。」（國民雜誌第一年第四號）民國五年三月間，國父自日本歸抵上海，先生隨侍，於擔任記室之餘，並從事於宣傳工作。每有著述，多在「民國日報」發表，曾有四十日連續發表有關日本文字，後輯印成冊，曰「日本論」。翌年八月隨 國父南下廣州護法。民國七年五月，隨 國父自粵過臺灣抵滬與沈玄廬、孫棟三兩先生創辦「星期評論」，宣傳社會建設，凡膾炙人口之著述如「法的基礎」等，均刊於週刊。陳果夫先生利用錢莊信房，寄遞該刊，廣為推銷。（陳果夫先生全集，「關於新聞記者及

新聞事業的經歷」。

民國八年，歐戰告終，國父在上海創辦「建設雜誌」，八月一日，創刊號問世，司筆政者有胡漢民、朱執信、廖仲凱、戴季陶等。薛仙舟先生常與季陶先生論合作制度。先生應邀在復旦大學作合作理論政策之經濟學講演，旋將講義大要，撰為論文，發表於「建設雜誌」。是年，先生與胡漢民、朱執信、廖仲凱奉 國父命編輯中小學教科書，後以 國父於翌年回粵建立革命軍政府，事遂停頓，先生亦隨侍南下。

民國十三年，先生被舉為中央常務委員，兼任宣傳部長。與廖仲凱共同提議成立中央通訊社，為宣傳部成立後之第一件大事。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是年三月二十八日發出第二十九號通告：

「為通告事：本委員會為求新聞確實，宣傳普及起見，特由宣傳部組織中央通訊社。凡關於中央及各地黨務消息暨社會經濟政治外交教育軍事，以及東西各國最新之要聞，足供我國之參考者，靡不為精細之調查，系統之記述，以介紹於國人。茲經籌備妥當，定於四月一日開始發稿。惟組織伊始，未臻完善。本會規定各地黨部及黨員，均有供給新聞資料之義務。特此通告貴部轉知所屬黨員，一體知照，共同負責，按上開各項，如有消息可作新聞資料者，請於每日上午十二時以前投稿，逕寄越秀南路五十三號該社代為發表。不勝翹企之至。」

先生任宣傳部長，工作至為辛勞：「僅有兩秘書與四五位同事。辦事房只有兩間，部長、秘書辦事房大約有一百五十方英尺。……宣傳部司

一切對外發表之言論。無論組織工人農民商軍人青年婦女海外乃至其他不必設部之機關，凡在中央直轄之下，而又在中央所在地，為耳目所及者，除各該機關之公文外，舉凡一切對外發表之文告，無論是否印刷品，皆非經宣傳部審查，由部長簽字，蓋章發回該部後，不能隨便自由發行。……部中人員太少，經費太少，所有動筆寫作，幾靠部長一人。」（戴季陶先生文存「對宣傳部之意見」，廿九年二月）。

國父於民國十二年八月在穗手創廣州「民國日報」宣傳部成立後劃歸管轄，是為中央直屬黨報之始。旋 國父北上抵京，謀開國民會議。翌年初命邵元冲創辦北京「民國日報」，於民十三年二月廿日發刊。參與言論與編務者有吳稚暉、戴季陶、劉禹生諸先生，幾日集報社，研擬宣傳要點。眾認此時宣傳方針應以和平建國為主，而針對北方政治，予以暴露式之攻訐。季陶先生認為和平建國運動，此番未必能成功，宜利用機會對主義與政策，作廣泛之宣傳。在宣傳技術上，與其對北方腐敗政治之暴露，不如作積極性主義之宣傳，尤其應在青年領域中生根發芽。最後眾皆同意先生意見，是以北京「民國日報」論調，均本此而行。國父逝世後，北京「民國日報」因抨擊議員賄選被封閉，出報僅四週二十八天。（改造半月刊第十三期羅敦偉：悼念戴先生）。

民國十四年 國父逝世，治喪移殯結束後，先生回滬，設季陶辦事處，埋首著作，先後完成「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」及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」二書，並創辦「獨立旬刊」自撰自題，為發刊詞。民國十六年，先生訪日歸國，有「日本

論」之作，於十七年春出版。是年冬，又將在中山大學講演紀錄，加以整理，哀其有關青年反省及救國救世立人立己者，分為三篇九章，彙為一冊，定名「青年之路」，在上海出版。十一月與陳果夫、陳布雷諸先生創辦「新生命」月刊，創導本位文化建設。

民國十九年二月，二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，先生被舉為中央常務委員，再度兼任宣傳部長。是年八月成立中央廣播電臺。開播典禮中，先生致詞。翌年改任訓練部長。十八年三月，先生又與陳果夫、葉楚滄兩先生草擬擴建廣播電臺計劃，提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，即開始籌備，於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開播。嗣後先生出任考試院長，脫離記者生涯，惟對於教育、文化及宣傳，恒有創見，並予指導。又先後創立新亞細亞學會，邊政學會，考政學會等，發行月刊與叢書。

先生謂社論宜專一而發揮力量：「就報論報，此半年來吾人許多好文字，未嘗收得較多之成果者，技術本身亦不能無問題。第一缺陷，許多好社論其用力不能把握時間空間，而集中於論鋒於一事，似為用力多而收穫少之一大原因。試就半年中每月之文字，作一統計觀之，便可見其缺陷之所在。例如星期一之論題為軍事，星期二之論題為教育，星期三為經濟問題中之某一專題，星期四為外交上之某一專題，星期六又為專論地方政治。如此作法，所費之心力雖多，然而一個月中，幾無一個集中點。無論為批評，為主張，為研究，用力皆未能專一。因此之故，篇幅文章皆好，而篇幅文章皆難發揮其最大限度之力量。」先生繼謂昔年「辦報」對社論所採方針為「看

定一個時局中心問題，決定要對此一中心問題達成目的，貫徹意志，便將整個報紙的力量，從多方面向一點集中。假定說是批評某人某事，必定在一定時間內，每天捉住批評的對象，一點不放鬆。」（戴季陶先生文存「致宣傳部梁部長書」卅三年十月）。

先生謂報紙應為計劃編輯：「假定說是要主張一個政策，建立一個理論……必定要由決定方針而計劃，而施工，而完成而利用。如是每逢定了一個主張之後，絕對是貫徹到底，而且貫徹此一主張，不只社論本身要貫徹，要達成所希望的目的，而為此目的起見，從各方面的電報要聞的選擇起，以至於普通新聞，乃至小說的選擇，都要貫徹社論的主張，向着同一目標一致前進，絕不肯社論自社論，新聞自新聞，雜著自雜著。到真正要緊問題發生的時候，便是廣告也不肯一點放鬆。」（同上）。先生批評當時中央日報：「此一月來，確實認為十篇社論總有八九篇是認真費心研究，然後作出的好文章。然而全部看來，不能達到一個強字的原因，就是整個紙面缺乏計劃的統一與力量的集中，於是便很難把讀者的精神、意志、感情，運用如意。」又謂：「今日中央日報第三版第一條新聞之標題，有『全國洶湧從軍狂瀾』八字，頗覺其造句選字，均未甚妥當。狂瀾二字，在中國舊日習慣上的用法，似含義並不甚好。此種大事，以洶湧狂瀾作標題，似乎閱之於心不安。造題排欄，均是紙面上整理的大事，不能不十分審慎。且報紙是最有力的國文教科書，也是最重要的常識教科書，尤其標題妥當與否，關於青年心理甚大。」（卅三年：致宣傳

部梁部長書）

先生謂：「新聞之記載，其必要具備之條件有四：一曰新，二曰真，三曰精，四曰敏。四者缺一，均非真正有益之新聞。一曰新。新聞紙者，傳佈社會間所發生之新事件，新思想之機關，其一切取材，當然以新為第一要義。無論何種記錄，若缺乏新的要素，則絕對不能成為新聞。二曰真。新的記載至多，若新而不真，則必無價值。例如虛偽之戰報，以及錯誤之商情報告，此種反乎真實之意義者，斷乎不成其為新聞。三曰精。新聞應新中選真，真中選精。四曰敏。新聞紙為現代社會之寫真，同時又為一切人民行為之導師。任新聞紙之編輯者，若能隨時隨事，以敦厚為心，以敦謹處事，為人類保存太和元氣，為社會指示正當坦途，勿以污穢刻薄之記事專為社會造不良之標本，則無形之中，造福人類，非可計量。」（戴季陶先生文存「祝晨報週歲」，廿二年三月卅日）。

民國卅三年四月，中央通訊社成立廿週年。先生致函祝賀：「回憶二十年前之今日，本黨改組伊始，實是時適任宣傳部長，故中央社之紀念日，實具無限歡欣」，並指示中央社：「今後努力之途徑，似宜於政治之外，更闢經濟通訊一門。軍事外交，自然應包入政治之中。所謂經濟通訊者，亦曰商業通訊，此實開闢財源以津補政治通訊之大道。目前戰時，自非經營開始之好時期，然培養人才，規劃路線，逐漸從實際上訓練通訊技術，已非着手不可。然後戰事結束，各國經濟復員開始之時，方能與之相應，展開此項特殊工作。在國外之大通訊社，其政治通訊亦大半賠錢

，若非政府津貼，其普遍通訊網，實不易佈置，而所賴以獲利作政治通訊之補助者，亦惟有經濟通訊而已。且今後外交宣傳，其主要亦在經濟。蓋外交云者，非常時期為軍事，平時則為經濟文化。至於狹義之外交行政，平常消息既毫無價值之消息，又多為秘密。若非從經濟通訊上奠定基礎，實無可以發展之路線。至於經營此種通訊之法，其人才技術組織，皆與平常之政治通訊不同。長於此者，未必善於彼。；；故中央社今後之事業，不獨不能僅靠與各通訊社之特約合同，即本身事業之擴張，亦不能獨賴普通電報通訊。」（戴季陶先生文存「致中央通訊社通訊社長書」，卅三年四月）。

先生曰：「余昔年之作記者生活也，同業中或可認為尚非無能。今之晨報之地點，實為廿五年前余始入上海新聞界而為記者之所在，其後而天鏗而民生而民權，言論界中，皆知有若此之一人」。「對於發稿與看大樣，決不敢有一夜的疏忽」。先生勗勉新聞界：「蓋編輯者，自身無一事也，天下之事，天下之人，其性情之變化無涯，其事態之演進無窮，編輯者都須一一以自己之方寸，應付之，運用之。一枝筆強於十萬兵。」（戴季陶先生文存「祝晨報週歲」。）

敬請批評指教

歡迎訂閱投稿